

保守主义思想译丛

〔法〕约瑟夫·德·迈斯特 著

信仰与传统

——迈斯特文集

 商务印书馆

保守主义思想译丛

信仰与传统

——迈斯特文集

〔法〕约瑟夫·德·迈斯特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与传统——迈斯特文集/[法]约瑟夫·德·迈斯特著,冯克利,杨日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5647-2

I. 信… II. ①迈… ②冯… ③杨… III. ①中东-通史 ②巴勒斯坦-通史 IV. K3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9826 号

保守主义思想译丛

信仰与传统

——迈斯特文集

[法]约瑟夫·德·迈斯特 著

冯克利 杨日鹏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647-2

2010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论法国	1
第一章 论革命	1
第二章 对法国革命中上帝意图的推测	6
第三章 人类遭受的残暴祸害	20
第四章 法兰西共和国能够维持长久吗?	26
第五章 论法国革命的反宗教性质——兼论基督教	35
第六章 论神对政体的影响	43
第七章 法国政府无能的标志	48
第八章 论昔日法国的宪政	56
第九章 如果发生反革命,怎样进行为好?	62
第十章 论反革命的所谓危险	64
论宪政生成原理	73
主权之研究	129
卷一 论主权的起源	129
卷二 主权的性质	153
论教皇	177
卷一 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关系	177
卷二 论教皇和世俗主权的关系	181

卷三 教皇同文明和人民福祉的关系	191
圣彼得堡对话录——论神在人间的统治	196
对话一	196
对话二	211
对话三	230
对话四	232
对话五	244
对话六	264
对话七	273
对话八	292
对话九	306
对话十	311
对话十一	328
论牺牲	333
 译名对照表	343
迈斯特年谱	350
研究文献一览	353
迈斯特法文版著作要目	353
迈斯特著作英译本要目	354
迈斯特研究文献选录	354

论 法 国

第一章 论革命

我们大家都被一根柔韧的链条拴缚于上帝的御座，它约束我们，但不奴役我们。在天下万物的秩序中，最令人称奇的事情便是自由人的行动受神明的支配。他们自由地做着奴隶，其行动既是自愿的，又是必然的。他们确实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又无法打乱全局。每个自由人都处于一个活动范围的中心，该范围的直径随“永恒几何学家”的决定而各有不同；永恒几何学家能够扩展、缩小、核查或引导人的意志，但并不改变它的本质。

人造之物，皆如其制造者一样可怜；他眼界褊狭，方法有限，拙于算计，举止艰难，成果单调乏味。神的创造物却无限丰富，甚至显现于细微末节之中：神的力量毫不费力地运作，在它的手中，万物服服帖帖，它所向披靡；万物皆为其手段，不成其障碍；自由因素的活动带来的失序，都会逐渐融入总体的秩序之中。

想想钟表的情况吧，它的全部发条和簧片的弹力、重力、体积、形状和方位都在不停地变动着，但它总是不变地显示着正确的时间。想到这一点，对于自由人的行动与造物主的宏图之间的关系，

就会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了。

政治和精神领域就像自然界一样,既存在着一种正常的秩序,也有一些超出这种秩序的例外。通常我们看到同样的原因产生一连串结果;但在某些年代,我们却看到正常的结果被中止了,事因失效了,出现了一些新的结果。

“奇迹”乃神或超越人类的原因所致,它让通常的原因暂时失效或是与之相悖。隆冬寒天,倘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命令一棵树马上长满叶子和果实,这棵树又应声照办,那么人人都会称之为奇迹,并且拜倒在这位魔术师的脚下。法国大革命以及现今发生在欧洲的一切,就其发生的过程而言,跟正月天的树上瞬间长出果实同样不可思议,人们非但没有啧啧称奇,反而若无其事,或是尽说些无聊的废话。在人类未作为动因介入其中的自然秩序中,他对于自己不理解的现象随时会报之以诧异;而在他本人活动的范围内,他觉得自己的自由行动就是事物的成因,傲慢的态度易于使他认为,凡是自己的力量被中止或打乱的事情都是一团糟。

人力所能及的某些行动,通常会对事物的进程产生一定作用;倘若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明白或者自以为明白为什么;他知道困难所在,他对此做出评估,他不会对什么东西感到惊讶。

可是在革命的年代,束缚着人的绳索骤然收紧,他的活动空间变得局蹐,他弄巧成拙。一种莫名的力量让他身不由己,他为此怒火中烧,他非但不感激那只紧攥着他的手,反而不予理睬,甚至恶语相向。

“一切都让人看不懂了”,是一句流行的口头禅。如果这话能引导我们认识世人如今面对的这一宏大场面的根源,它便是很明

智的;如果它只是在表达怨恨或空洞的沮丧,它便是一句蠢话。到处都在这样喊:“怎么会这样呢?恶贯满盈的人居然战胜了全世界!恶毒的图谋弑君者居然大获成功!全欧洲的君主政体都麻木了!它的敌人甚至在王位上也找到了自己的盟友!①坏人事事得逞!正派人所做的一切都遭遇不幸和嘲笑,坏人实施最宏大的设想却顺畅无比!整个欧洲的舆论都在控告信仰真诚的人!一流的国务活动家一错再错!最伟大的将军出尽了洋相!”等等。

无疑,由于基本条件已经成熟,预防革命的手段便不复存在了,希望阻止革命的人也无望取得成功。但是,当神否弃人类的行动而独自发威时,那目的是再明显不过的,神意也是再清晰不过的。这便是我们此时此刻见到的事情。

大革命中最令人吃惊的,便是这股所向披靡的驱动力。人力对它的一切反抗,皆如草叶一般被席卷而去。凡是跟它作对的,无一能够免于惩罚。纯正的动机可以为抵抗增光,但也仅此而已;这股要求绝对服从的力量,不屈不挠地奔向它的目标,不加区分地清除了夏雷特、迪穆里埃或德鲁埃。②

有人以充足的理由说,是大革命带动着人,而不是人推动着大革命。这种观点太有道理了。它或多或少适用于一切大革命,但它从未表现得像今天这样醒目。即便那些看似领导着法国革命的

① 大概是指 1795 年普鲁士和西班牙分别与法国缔结和约。——英译者

② 夏雷特(François-Athanase Charette, 1763 ~ 1796):大革命期间旺代的保皇军首领。迪穆里埃(Charles-François du Périer Dumourier, 1739 ~ 1823),大革命前的将军,1790 年加入雅各宾俱乐部,屡立军功。德鲁埃(Jean-Baptiste Drouet, 1763 ~ 1824),法国大革命时名噪一时的人物。1791 年 6 月路易十六外逃时,马车恰好停在德鲁埃家门口,被其识出,导致国王被捕。——译者

恶棍,也不过是作为单纯的工具参加了革命,他们一动驾驭革命的念头,就不光彩地垮台了。那些创建共和国的人,既不要共和,也不知道自己在创建什么。他们总是为时势所左右,先前的计划从不会得到落实。

罗伯斯庇尔、科洛或巴雷尔^①,从未想过建立革命政府和恐怖统治;是环境使他们不知不觉走到了这一步;人们再也不会看到这样的事情了。这些平庸至极的人,对一个罪有应得的国家实行着有史以来最残暴的专制统治,在这个王国里他们的权力大得惊人。^②

然而,就在这帮坏透了的暴君干尽了坏事(在革命的这个阶段,也必然如此)之际,一阵微风就把他们吹倒了。这个让法国和欧洲为之颤抖的庞大政权,连最初的一击也承受不住。这场完全罪恶的革命没有丝毫崇高和尊严的迹象,所以上帝下令用“九月屠夫”^③给它第一次打击,以便让司法本身也随之堕落。^④

① 科洛(Jean-Marie Collot d'Herbois, 1749 ~ 1796):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派。后参与过推翻罗伯斯庇尔的活动。巴雷尔(Bertrand Barère, 1755 ~ 1841):雅各宾独裁统治时的主要成员之一。——译者

② 手稿中插入了这样一段话:“这种专制统治是对一个以犯罪方式追求自由、其罪恶努力的导致了最可怕的弑君罪的民族的惩罚。”——英译者

③ “九月屠夫”(Septembriseurs):1792年8月巴黎民众推翻君主政体后,怀疑狱中的教士和犯罪分子阴谋起事,于9月2日至6日杀死了1200多个被关押者。反革命派把参与这场屠杀的人称为“九月屠夫”。——译者

④ 出于同样的原因,荣誉也受到凌辱。一个记者(《共和报》的)十分机智而公正地说:“我很理解他们可以把马拉请出先贤祠,可是我绝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能从先贤祠中消除马拉的污迹。”有人抱怨说,他们看到图伦(Turenne, 路易十六手下最著名的将军。——译者)的尸体被遗弃在一个博物馆的角落里,与动物尸骨堆在一起。真是妇人之见!把他尊贵的遗骸放进先贤祠,生出这样的想法就够你受的。

人们常常感到诧异,极其平庸之辈对法国大革命的判断却优于一流的人才,在老练的政客还不相信法国大革命时,他们就已对它确信无疑了。正是这种信念,成了革命的一个构成要件;革命能够获胜,仅仅是因为这种革命精神的广度与力度,或者,倘若可以这样说,仅仅是因为这种革命的信仰。所以,一些无才无识的人,才能驱动他们所说的革命战车。他们冒险犯难,毫不畏惧反革命;他们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们事事顺遂,因为他们不过是一种比他们更有见识的力量的工具。他们在革命生涯中从未迈错步子,其原因一如沃康松笛手^①从不走调。

革命洪流曾经连连改变走向,革命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只是由于顺应当时的要求,才获得了属于他们的权势和名望。他们一旦对抗时势,哪怕只想抽身而退,由着自己的嗜好做事,以此改变它的预定进程,他们立即就从舞台上消失了。……

总而言之,越是考察大革命中那些看上去很活跃的人物,就越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些被动而机械的东西。再重复一遍这句话亦不为过:根本不是人在引导革命,而是革命利用了人。完全可以说,“它根本就是自动进行的”。这话的意思是,神的意志从未如此清晰地展现于其他任何人间的事件上。如果它使用了最卑劣的工具,这是为了用惩罚使之获得新生。

① “沃康松笛手”是法国发明家雅克·德·沃康松(Jacque de Vaucanson, 1709 ~ 1782)于1737年发明的一个机械长笛演奏器。——译者

第二章 对法国革命中上帝意图的推测

每个国家就像每个人一样,都有它必须履行的使命。否认法国对欧洲行使着真正的主宰之责是没有用的,虽然它以罪大恶极的方式滥用了这一职责。尤其是,法国在整个宗教体系中处于首位,它的国王被称为十足虔诚的基督徒,并非没有道理:博絮埃^①在这一点上并未言过其实。然而,法国利用其影响力来败坏自己的使命,让欧洲变得道德败坏,所以难怪只能用骇人听闻的方式使之重归正道。

已经很久没见过如此令人惊恐的惩罚,如此多的罪人受到处置了。在不幸的人中无疑有无辜者,但他们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少。

所有那些极力让人民摆脱宗教信仰的人,所有那些以玄虚的诡辩反对财产制度的人,所有那些叫喊着“只要对我们有好处就干到底”的人,所有那些随意玩弄国家根本大法的人,所有那些提议、赞同、支持用暴力手段对付国王的人,等等,等等;即使是我们有限的视野能够看到的所有那些想要革命的人,都非常公正地成了它的牺牲品。

人们抱怨说,连著名的学者也倒在了罗伯斯庇尔的屠刀下。以人道论,再怎么哀悼他们也不为过;但是神的正义对几何学家或

^① 博絮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 1627 ~ 1704):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天主教主教,著文鼓吹绝对君权论,专制主义理论家。——译者

物理学家是一视同仁的。有那么多法国学者成了这场革命的主要发起人；有那么多法国文人学者成了大革命的帮凶，有那么多赞人赞成并鼓励革命，只要它像塔克文^①的权杖那样只砍统治者的头即可。他们像其他很多人一样断言：“大革命的发生不可能不带来一些灾难。”但是，如果一位哲学家为了安慰自己而从结果的角度看待这些灾难；如果他在内心里自言自语，“杀人十万的事就别再提了，只要我们能获得自由就行”，好吧，如果上帝回答他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你也是被杀者中的一员。”这有什么不公正吗？难道我们在自己的法庭上会作出不同的判决吗？

细节或许是令人厌烦的；然而，对于他们所谓的大革命的无辜牺牲者，几乎每个有良知的法国人都会想到：

你已看到自己的错误带来的恶果，
你也该承认自己招来的打击。^②

我们关于善与恶、无辜和有罪的观念，经常受到我们偏见的影响。我们看到两人拿着三寸小刀打架，就说他们有罪而可耻；倘若那是三尺长的利剑，打架就成了尊贵的行为。我们痛斥从朋友的荷包里偷了一分钱的人；他若占有了朋友的妻子，反而啥事儿也没有。对于人们以为能够提升崇高或可爱品质的那些哗众取宠的不规之举，尤其是能获得成功报偿的，我们即或不予赞扬，

① 塔克文(Tarquin)：传说中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罗马皇帝，害死前任君王篡权登基。——译者

② Racine, *Iphigénie*, v, 2。

也总是给予宽恕。环绕在有罪者身上的闪光品质，从真正公正的眼光看来，是在毁坏他的名誉，他最大的罪行是滥用了自己的天赋。

每个人都有某种职责要履行；这些职责的大小，与他的社会地位和能力的大小相关。同样的行为，若是两个不同的人干的，其应当获罪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为了避免扯得太远，不妨说，一个突然获得无限权力的卑微小人物，他因过错或愚蠢的品性而做出的举动，若是放在一个主教、公爵或类似的人物身上，就是丑恶的罪行了。

确实，有些行为，按照常人的观点是可以宽恕的，甚至是值得赞许的，从本质上说却是极其罪恶的。比如，假使有人说：“我真诚地拥护法国革命，是出于对自由、对祖国的纯洁的爱；我凭自己的良心深信，法国革命将导致革除陋规恶习，造福于天下。”对此我们无以作答。可是，能够看透人心的人，却洞察到了罪恶的污迹；他从微不足道的争执中，从傲慢态度的轻微表露中，从卑劣或罪恶的激情中，发现了那些我们乐于向世人吹捧的坚定品格的原始动机。而且在他看来，用伪善的谎言去美化叛逆行为，是罪上加罪的。但是，还是让我们谈谈我们的整个国家吧。

人们可能犯下的最大罪行，无疑是侵犯至上的权力，其后果是极其可怕的。如果这种至上的权力属于一人，而此人又惨遭杀害，则该罪行就是一种变本加厉的残暴行径。倘若这个君主不是因自己的罪行而遭此厄运，倘若他的美德使得对他施加的罪恶益发严重，那么这简直就是一种无以名状的罪行了。这便是人们从路易十六之死看到的情况；但是指出下面一点也很重要，这桩滔天大罪

的同谋犯之多,是无出其右的。处决查理一世的同谋要少多了,虽然对查理一世可以指控一些罪名,那是路易十六从未犯过的,并且有人为他出具了许多最需要谨慎对待、最有利的证据。连奉命行事的刽子手,也不敢让人认出自己。而在法国,路易十六在六万名荷枪实弹的人中间走向死亡,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国王放一枪以示致敬,没有为这位不幸的君主鸣一句不平,外省跟首都一样缄默无言。他们说:“这会连累自己的。”法国人呐!如果你以为此说在理,那就别再奢谈你多么勇敢了,或干脆承认这是在糟践自己的勇气得了!

军队的冷漠也同样令人刮目。军队为处死路易十六的刽子手效劳,比昔日为国王本人效劳还卖力,因为军队已经背叛了他。看不到一丝不满的迹象。总之,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参与如此的滔天大罪(当然,参与程度无疑是不同的)。

有必要补充上一个重要说明:以全体国民的名义对君权实施的任何侵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全体国民的罪行,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全体国民作下的孽,无论以他们的名义犯罪的是哪个乱党。因此,虽然不是全体法国人都想让路易十六死,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们对一切的疯狂、一切的不公和一切的胡作非为听之任之,历时两载有余,才导致了1月21日惨祸的发生。

如今,国民对至上君权犯下的所有罪行,都受到了迅速而可怕的惩罚,这是无人可以逃避的法则。路易十六被处决后没过几天,有人便在《环球信使报》(*Mercur universel*)上写道:“此事也许有点儿做过头了。但是,既然我们的立法者已为此承担起了责任,那就让我们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化解一切仇怨,不再纠缠于此事。”说得

轻巧！当初也许不该杀害国王；可是既然事已至此，那就别再提这事了，大家还是握手言欢为好。竟有这等混账话！莎士比亚在说出下面这段话时，更明白事情的轻重：

“每个庶民必以其全副的力量和心智
抵挡灾祸，保全自家性命；
维系众多生灵的魂魄之安危更复如此。
君王之死，实非一人之死，
它将如同旋涡，
捎带着近旁的一切。”^①

路易十六的每一滴血，法兰西都要为之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这一场反宗教、反社会，并以弑君罪而登峰造极的造反，这一桩全国性的大罪，也许要由 400 万法国人以自己的性命去抵偿。

那些最早宣誓效忠国家的国民卫士、士兵和将军们，而今安在？那个罪孽深重的议会，作为修饰而给它加上的“制宪”一词，将成为千古笑料，它那些领袖们和偶像们，而今安在？米拉波去了哪儿？巴伊^②和他的“美好时光”又去了哪儿？发明“剥夺所有权”这个说法的图雷呢？还有奥塞兰，这位就宣布流亡贵族为国家公敌的第一部法律向议会作报告的人，为何也不见了踪影？那些早已

^① 《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三场（这里的译文参考了朱生豪先生的译本）。——译者

^② 巴伊（Jean-Sylvain Bailli, 1736～1793）：法国天文学家、政治家。大革命爆发时任巴黎市长。10月5日国王被迫从凡尔赛回巴黎时，巴伊曾致欢迎辞说：“陛下，这是一个多好的日子，巴黎人在自己的城市迎来了陛下和他的眷属。”——译者

暴毙的革命活动家们的名字盈千累万，不胜枚举。

但是，这里我们仍可赞赏无序中的有序；即使人们很少想到，有一件事还是十分明显的，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只能在其同谋的打击下垮台。假如只出现了所谓的“反革命”，且使国王得以复辟，是没有办法让正义得到伸张的。让感情用事的人亲自审判杀害自己父亲、亲属和朋友的凶手，甚至是审判侵夺自己财产的人，乃是极大的不幸。假如这事让反革命分子摊上的话，恰恰就会发生上述情况，因为，由事情的性质所定，高级法官几乎全都属于受伤害的阶级；司法纵然只以惩罚为目的，也会有挟机报复之嫌。况且，合法的权力机关在惩罚参与者甚伙的罪行时，总要保持一定的节制。法定机关如果为了同一项罪行而处决五六名犯人，那就变成屠杀了；只要超越了某些界限，它就会变得令人憎恶。总之，大罪必须施以重罚，这是很不幸的；所以，事关弑君之罪，便很容易做得过火；奉承献媚者很容易变成刽子手。难道神圣的正义之剑也要像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那样无情地起落？难道还要把王国的刽子手和炮兵马队全部召集到巴黎，把人们碎尸万段？难道还得用一口大锅熔化铅块和沥青，用它去泼洒那些已被烧红的烙铁撕裂的肌体？再说，如何为不同的罪行定性？如何把肉刑分成三六九等？尤其重要的是，没有法律，如何实施惩罚？有人会说，“挑出要犯，余者概予赦免”。而这正是神意不希望发生的。它是全能的，所以它不会理睬因无力惩罚而给予的赦免。必须完成大清洗，必须盯住一切！必须为法国这块真金涤除酸腐不洁的杂质污迹，使它在未来国王的手中变得更加纯净柔顺。毫无疑问，上帝过去不必用惩罚来指明自己的正道；然而在这个时代，

上帝却现身于我们可以感知的范围，如同人间的法庭那样进行着处罚。

过去曾有些民族，就像犯罪的个人一样被真正判了死刑，我们能够理解其中的原因。假如上帝的安排之一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向我们显露其意图，我们就会像看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一样，读到他对法国人的刑罚。我们何必还要知道更多呢？这惩罚不是已经呈现于眼前了吗？我们不是已经目睹了法兰西被成千上万桩杀人案弄得名声扫地了吗？在这个美丽王国的大地上，不是断头台林立了吗？通过司法部门的集体屠杀，在这片不幸的土地上，不是已经浸透了它孩子们的鲜血了吗？那些毫无人性的暴君，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不是已经把这鲜血挥霍于残酷的对外战争了吗？从未见过这般嗜血成性的暴君在如此肆无忌惮地草菅人命，也从未见过这般麻木不仁的人民，如此乖顺地任人宰割。刀光火丛，饥寒交迫，缺吃少穿，苦难百端，凡此种种，都没有使人民感到不堪忍受：天命所定的一切，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直至判决付诸实施，见不到任何违抗。

然而，在这场残酷的、灾变式的战争中，又有多少利害攸关的时刻！赞美之词又是怎样接二连三地随着忧患而至！我们就以大革命最恐怖的岁月为例；我们不妨设想，在恶魔般的治安委员会的统治下，军队突然哗变，一下子成了保皇党；我们再假设，军队在自己一方召开初级议会，自由地任命最有教养、最可尊敬的人士，在此危难时刻为它指引方向；最后我们假设，在军队选出的这些人中间，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正直忠诚的战士们，有时，人的聪明才智也只能多害相权取